

多元论与自由 :伯林反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

■ 蒋柳萍文 王邦佐荐

一般认为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亲和性,理性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但伯林却力图拆解这种幻觉,指出启蒙运动企图按照普遍真理的概念来理性地安排社会,这严重威胁到个人追求自身目的和价值的自由。伯林反对为自由主义寻找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提倡重构多元论的自由主义,认为惟有价值多元论才能一以贯之地保护个人自由这一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使其不受体系建构者的劫掠与侵夺。但是,伯林的自由主义思想缺乏一种内在的连贯性和明晰性,其思想内部存在着一些危险的张力。

[关键词] 启蒙运动;一元论;多元论;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6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06)01-0050-08

蒋柳萍(1975—),女,广西柳州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03级博士生。(上海200433)

学界通常认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源于启蒙运动,它把合理性的增进确认为自由增进的首要条件。^[1]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者认为,自由的个人以理性构建历史,以理性规划自己的生活历程,他们认为通过发挥理性的作用将会把所有的人带向自由与解放。理性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规定,也是实现人类理想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正是这种无所不能的理性将把人们带入未来的自由王国。这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给自由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因此,这种以启蒙的理性主义为其哲学基础的自由主义也可称为启蒙的自由主义。然而,这种观点日益受到来自各方的质疑和批判,其中以当代政治哲学家伯林的批判最为典型。那末,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之间果真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这种亲和性是否仅仅是一种幻象呢?启蒙方案究竟会带来何种后果?是否存在替代性的方案呢?伯林对以上问题一一作了解答。

一、对启蒙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批判

伯林赞成启蒙运动的基本价值,认为启蒙运动是“人类生活中的最好和最希望的事情之一”。^[2]他公开肯定启蒙运动的代表们有勇气反对那个时代的许多罪恶,包括无知、压迫、残酷和迷信,以及对理性、自由和人类幸福等理想的追求。^[3]他称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为伟大的解放者,“他们把老百姓从恐怖主义、蒙昧主义、狂热盲目以及其他荒谬绝伦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他们反对残忍、反压迫。他们跟迷信无知以及许许多多败坏人们生活的勾当进行了一场胜利的战斗。”^[4]但与此同时,伯林几乎又是敌视启蒙运动的。他把启蒙运动的本质界定为一元论的,认为启蒙运动自始至终贯穿着那种认为“真理之光不管何时何地都是一样的”理性主义一元论思想。

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基本特征是:第一,所有真正的问题都必须只有一个正确的答案;第二,这类真理的发现必然有可靠的途径;第三,这些正确的答案,彼此必然共同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5]尽管这种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但伯林认为一元论的思想在18世纪的启

蒙思想家那里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并把它视为 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的主要思想特征。^[6]他这样写道：“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机械的进步论的信仰者，怀疑论的悲观主义者，无情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以及多愁善感的德国诗人和思想家，似乎一致相信通过发现一个惟一正确的答案所有的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7]18 世纪的启蒙思想家相信：世界拥有一个永恒的、不变的结构，这个结构受普遍和永恒规律的支配，启蒙的最终目的就是消除知识的障碍而消灭谬误，自由就是从谬误中解放出来，认识支配这个世界的普遍的规律。总的说来，大部分启蒙思想家的思想都带有理性主义一元论的特征，他们的思想倾向于教条化和简单化，主要体现在：第一，启蒙运动思想家机械地将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到人类事务中去，他们认为“只有科学能够拯救我们”，消除我们的麻烦，因此，有理由把科学方法运用于一切领域。^[8]第二，认为人性是固定不变的，人性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存在一个人类本性的实体；第三，与基本不变的人性观相应，认为存在某些人类在其生活过程中可以一致实现的普遍价值的信念。这些理性主义思想家全都相信，在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从原则上说可以找到一个惟一的、对事实和价值问题同样正确的统一的知识体系。他们追求无所不包的方案，普遍有效的统一架构，在这个架构中万事万物展现出系统的——既符合逻辑或因果律的——相互关系，以及宏大而严密的结构，它没有给自发的、出人意外的发展留出丝毫余地，其中发生的一切事情，至少从原则上说，都可以根据不变的规律完全得到解释。^[9]在《西方乌托邦思想的衰落》的文章中，伯林对启蒙运动的一元论本质作了经典的说明：

启蒙方案似乎确信：人们必须按科学的方法弄清人类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他的成长和完善需要什么。当人们弄清他是什么以及他需要什么的时候，人们这才知道在哪里可以发现它……从而为人类提供他所需要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达到至少比目前更加幸福与合理的状态，即便这种状态尚未达到完美的境界。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境界，是因为愚昧、偏见、迷信、无知、情欲遮盖了理性……这一切使得人们长期生活在一种可悲的境况中。这样一来，人们不能遵循世界原有的面目来生活，人们难以获取改善他们自身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仅有科学知识能够拯救我们。这就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基本信条。^[10]

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思维，相信人类凭借科学和理性的活动，运用恰当的方法，就一定能够找到一劳永逸地解决人生所有问题的答案。按照这种思维，“冲突与悲剧不是构成人生命内在的特性”，因为人类遇到的所有问题原则上都有完美的解决方法，不但如此，这些解决方案之间是和谐一致的，因此，人生所谓的冲突与悲剧，在原则上都是可以避免的。这种理性主义一元论的信念是以普遍的人性论为其基础的，即认为存在一个人类本性的实体，人性的基本特征在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是一样的。这种普遍的人性论隐含着这样一种推论：理性的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国家对于同样不变的基本需要必然要求同样不变的满足，因此，人类有着相同的目标，人类的命运是由人类本性的构成所决定的，人们无法改变其命运，只能理解由此而生的法律与规则，只有理解了支配人类的法律与规则，就可以用最有效的方式去追求幸福的生活。按照启蒙思想家们的设想，人类的价值观念可以从人类天性的事实中推演出来，所有人都想得到的东西都是一样的，而且这些东西彼此之间并不冲突。

然而，在伯林看来，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一元论的信念只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幻想，它缺乏对人类的悲剧状况的认识，他写道：“启蒙运动对道德冲突的悲剧特征麻木不仁，它天真地假设所有的困境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11]启蒙理想无法正视“人之价值的体认是复杂、分歧，并且互为独立的；人追求这些价值是为此价值之原故，别无其它。价值之复杂分歧也蕴含价值与理想彼此矛盾冲突的可能性，以及无法兼容并蓄。”^[12]在《孟德斯鸠》^[13]一文中，伯林反启蒙的理性主义一元论的态度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伯林声称他对孟德斯鸠最大的尊敬在于孟德斯鸠拒绝“启蒙运动所依靠的整个价值体系”。他赞同孟德斯鸠的学说，认为不可能在道德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获得惟一普适的方法，“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原则上，不可能存在解决人类事务的完美方法”。^[14]

如果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类似于自然科学问题的解决方法，存在一个惟一正确的答案，对于所有的人来说只有一种正确的生活方式，而且理性可以发现这一普遍真理，那么就需要对非理性者进行教育，甚至是进行强制，强迫他们变得理性、变得自由，这无疑给强制与胁迫提供了借口。伯林指出：“社会中的高级部分——受过教育的、更理性的、对其时代与人民有最高洞见的人，可能会运用强迫的方法使社会的非理性部分理性化。”^[15]

知道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智者则可以引导患者去过正确的生活,而尚未通晓真理和正确生活方式的人只能对自己说:“只有真理才是解放性的,我能够获得真理的唯一办法是盲目遵从你这个真理的知晓者今天命令我或强迫我做的事,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是我获得与你一样清晰的洞见、变得与你一样自由的惟一途径。”^[16]但是,这显然违背了自由主义的初衷,它所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压制与胁迫。正如伯林所揭示的那样: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学说威胁现代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和尊严,它将人类视为抽象历史力量的工具,致使人们在政治实践中,顽固地追求某种目标或理想,似乎它们是一种值得人们不惜任何代价去换取的至善,但结果往往却是要求人们以自由的名义实施强制或迫害。正如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非常著名一段话中所揭示的那样,“有时候个人必须被强迫自由”。^[17]

由此可见,理性主义一元论实际上是一种世俗形式的原教旨主义,讽刺的是这种世俗的原教旨主义呈现出很多与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相同的狂热的和不宽容的倾向,这往往是造成“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罪魁祸首。伯林曾不无讽刺地写道:“以这种方式,理性主义者的论证,以及它认为对所有问题存在惟一正确的解决方法的假定,一步一步地从个人责任与个人自我完善的伦理学说,转变为一种服从柏拉图式的守卫精英指导的极权国家理论。”^[18]

综上所述可得出结论:尽管启蒙运动大体上是信奉自由主义的,但是从本质上说它又是非自由主义的,因为启蒙运动所珍视的自由被认为是从谬误中解放出来、遵从普遍真理,这种力求按照普遍真理的概念来理性地安排社会的渴望严重威胁到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个人自由地选择自身的目的与价值。正如伯林所言:“使个人适应根据纯理论的理想构建出来的理性计划,最终只会导致人类可怕的灾难。”^[19]在伯林看来,最近两个世纪以来的很多政治灾难,都起源于启蒙运动的一元论方案。如果说启蒙方案已经破产,并不是像许多保守的反启蒙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个人自由本身是一种不足取的或不切实际的理想,而是由于启蒙运动那种建立在普遍人性论基础上的真理一元观与启蒙运动对个人自由的信奉之间的矛盾所造成的,这种情况类似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所论证的那样:启蒙的工具理性的概念挫败了它对解放与自由的渴望,启蒙运动所释放出的力量已经摧毁了它最初的信念。启蒙运动被一个关键的

矛盾一分为二,这个矛盾就是既主张人类有选择的自由,又坚持他们只应当在理性愿望的驱使下去进行自由的选择。^[20]伯林认为人们必须在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启蒙理想之间做出选择,要么选择自由主义,要么选择启蒙的理性主义一元论。

二、在多元论基础上重构自由主义

伯林认为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一元论并没有成功地自由主义作哲学上的辩护,反而容易造成“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强制与胁迫提供了借口。伯林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力图挽救启蒙运动中那些积极的东西不至于转化为专制和暴虐,这些积极的东西主要是:对教权和教条的攻击,为赢得国家专制下的人权和自由进行的奋斗,对人类理性本身的信仰等。为此,伯林拒绝为自由主义寻找一个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反对哲学家们在洞穴之外寻求真理,拒斥那种企图建构完美和谐的道德体系的幻想。他赞同约瑟夫·熊皮特的主张,即“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差异,在于前者了解个人信念只具相对有效性,但却能够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信念”。伯林补充道:“企图超越此限制或许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无可救药的形而上学需求;然而,让这需求决定个人的实践,却是一种同样根深蒂固且更加危险的道德与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21]在伯林看来,把自由主义建立在某种绝对道德价值体系上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他提倡在多元论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进行重构。

伯林通过涉猎反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思想,发现多元论的理念,建立起多元主义的思想脉络,并把它视为现代自由主义强有力的思想支柱。反启蒙运动是一股反对启蒙方案的潮流,它以肯定道德文化的多样性和拒绝相信普遍真理为其基本的内容。反启蒙运动强调生命、生活的丰富多样、分殊分歧,而不尝试寻求一确定、永恒的终极原则,以整合这万象分歧的世界。反启蒙运动的整个过程都闪烁着多元论的思想火花,因此,伯林把反启蒙运动视为一种多元论的模式,他对自由主义的捍卫就是在反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所倡导的道德文化多元论中得到加固的。^[22]

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的基本涵义可表述如下:人类所追求的价值或目的,尤其是终极性的价值与目的,不仅众多复杂、而且无法通约共量和兼容并蓄的,彼此之间会产生矛盾、对立与冲突,并且由于缺乏一个共通的衡量尺度,根本无法在其间比较高低,以便排定先后顺序,

因此，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层面上，我们无法建立一个普遍、绝对的准则或标准，以分辨价值的高低等级。如伯林所论：

有复杂的、客观之目的与价值，它们彼此之间无法兼容并蓄。不同的社会于不同的时期，或在同一社会的不同团体、或不同阶级、社会、或族群，或者在它们之中的任何个体成员，都各自追求这复杂、分歧的目的或价值，更甚者，任何人与群体都可能发觉自身处于这样的情境：因为是终极的、客观的、无法相互整合之价值或目的之诉求、彼此之间产生矛盾冲突。^[23]

在伯林看来，多元论比一元论更加准确地说明这个世界的实际特征，因为实在(Reality)是多元的、复杂的和不可简约或者同化成为一个单一的整全景象和模式。按照这种观点，真理并不是惟一的，通往真理的道路也不止一条。个人应该在那些相互竞争的善之间自由地作出选择，而且往往要牺牲一种善来成就另外一种善，因为相互冲突的善之间难以组成一个和谐的体系。伯林指出：“我们在日常经验中所遭遇的世界，是一个我们要在同等终极的目的、同等绝对的要求之间做出选择，且某些目的之实现必然无可避免地导致其他目的之牺牲的世界。”^[24]因此，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社会生活中，冲突与悲剧的可能性便不可能被完全消除。于是，在各种绝对的要求之间作出选择，便构成了人类状况的一个无法逃脱的特征，也正因为如此，自由选择才具有及其重要的价值。如果人们生活在像理性主义一元论者所描述的完美的、和谐的世界中，人们所追求的那些目的绝对不会相互冲突，那么选择的必然性与巨大的痛苦就会消失。价值多元论的事实使我们不得不在相互冲突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而由于选择缺乏客观的标准，我们需要宽容不同的价值和信仰。因此，伯林认为消极自由优先于其他的原则，它至少应该具有程序上的优先性，因为消极自由是在相互竞争的善之间做出选择的必要条件。这意味着存在着这样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个人可以不受干涉地自由地选择他们所信仰的价值，如果他们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没有伤及别人。

伯林的自由主义糅入了强烈的怀疑和悲剧色彩，这种自由主义与启蒙自由主义所信奉的确定性和狂妄的乌托邦的理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一元论者相信：人类理性不仅能够正确解决所有认知的和道德的问题，并且所有问题都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答

案，这些答案之间必须是和谐一致的，只有遵守理性所发现的正确答案，人们才能够变得聪明、幸福和自由。而在伯林看来，由于人的本性是冲突的，不存在一个普遍的至善状态，我们不知道确切的答案在哪里，或者根本不存在确定的答案，因此，我们必须面对得失并存的选择，由是之故，我们才是自由的。伯林以嘲讽的口气写道：“坚定的一元论者、无情的狂热分子、着迷于无所不包的和谐景象的人，根本无法理解那些无法使自己完全无视现实的人的怀疑与苦恼。”^[25]

那么，支撑伯林的多元论的基础又是什么呢？从伯林建立起多元论的理念的思想脉络来看，是他关于人性的多样性和矛盾性的观点。伯林反对启蒙运动那种普遍不变的人性观，认为从人的天性中不能推演出人类的价值观念。他赞同浪漫主义理论关于人类可能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观点，并以之取代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人性观，把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建立在对一种多元论的人性模型的确认之上。

伯林认为人本质上是选择者和目的的探求者。他认为把人的本质看做是固定不变的是一种非历史的观点，这种忽视历史的人性观是不符合现实和没有任何意义的。在《维柯与赫尔德》中，伯林写道：“当人的可塑性，尤其是他们通过自己的创造性活动改变自身的能力被这种人性观忽略时，这种人性观就变成一种对现实的歪曲。如果这种人性观被运用到现实中，只会导致各种错误和荒谬的事。”^[26]这使得伯林对维柯关于“人的哲学”的分析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寻求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人的本质必须不断地改变它自身，从而不断产生新的特征、新的需要，以及新的思想和行动类型……。”^[27]可见，伯林拒绝对人的本质作任何理性主义的说明，认为理性主义的人性观以一种看似不变的欲望和本能作为借口，要求所有的人遵照一种生活方式来生活。^[28]然而，伯林告诫我们，我们不必受到理性的迫害，人本质上是选择者和目的的探求者，是生活的意义的创造者，我们只有一个责任，那就是按照我们感到舒适的方式来生活。我在行动中创造，不管我是不是艺术家、哲学家或政治家，这不是因为我力求实现的目标从客观上说是美的、真实的或高尚的，也不是因为它受到公众舆论的赞成或符合多数或传统的要求，而是因为它是我自己的。^[29]正是由于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的这种不确定的特征，才赋予个人自由选择以如此重要的意义。

在多元论的基础上对自由主义进行重构，使得伯林的自由主义带有浓厚的社群主义的思想痕迹。伯林从维

柯与赫尔德的思想中得到启示,建立起他的文化多元论理念。伯林的文化多元论既强调“社群与历史文化的归属感”,也肯定文化之个别差异性,自然也注重每一个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性,认为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没有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分判它们的优劣高低,如伯林所述:

价值不是普遍性的,每个社会、任何民族,任何一个时代与每一种文明,皆拥有它独一无二的理想、(言行之)准则、生活方式、以及思想与行动的特性。并没有不变、普遍且永恒的律则,或标准。藉此,可以分判不同之文化与民族,甄别它们的优劣等级……任何社会、任何时代自有其传统、特性、风貌与格调。每一民族都有它自己的道德之重心引力,而跟其它民族有所不同,一个民族发展与增进它的需求、它的独特个性,这才是该民族的福祉所繫。^[30]

但是,在伯林看来,自约翰·洛克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由于与“启蒙运动”并时发展,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也表现出“启蒙理想”漠视文化差异性的倾向,认为文化的差异性不是构成人类本质的要素,而是某种短暂的、表示人的“偶然属性”的东西,它仅仅是人类发展的一个片断,是有待转化或超越的。伯林对文化多样性的感受力以及他追随赫尔德肯定语言对人之身份的塑造具有重要性,使得伯林拒斥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而与社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产生了共鸣。他谴责前者(启蒙运动的世界主义)低估了民族感情的重要性。与赫尔德一样,伯林指出:“世界主义是空洞无意义的,除非人们归属于某种文化,否则他就不可能得到发展。”^[31]伯林认为归属于某一文化实体是实现自由的一个条件,“如果个体想要获得真正的自由,就必须以稳固的文化归属作为保证”。^[32]但值得注意的是,伯林是在消极自由允许的范围内,才赞成献身于民族共同体的。因而,个体自由是伯林的社群主义可接受的外部界限。只有本质上温和的共同体形式才能够满足这种要求,伯林对文化归属的强调并不具备那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可以说伯林所提倡的仅仅是一种温和的文化民族主义。

三、伯林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内在张力

伯林质疑那种认为启蒙运动与自由主义之间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性的观点,指出启蒙运动并不是自由主义的唯一可能的合理基石,并非所有形式的自由主义都必然历史地或逻辑地源自启蒙运动。当然,只有在接受

伯林对启蒙运动的理解的前提下,伯林反启蒙的自由主义才具有说服力。至于伯林对启蒙运动的阐释是否正确,这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但值得一提的是,近二十年来,启蒙运动的含义更富争议性,对启蒙运动的看法及评价并无统一的认识。

伯林力图在多元论的基础上捍卫自由主义,把自由主义根植于价值多元论的诉求,并由此摧毁了自由主义的理性主义及绝对主义的基础。约翰·格雷(John Gray)和伽利博(Galipeau)指出伯林的思想的原创性及其重要价值在于:他对价值多元论的信奉以及把现代自由主义建立在价值多元论的基础之上,而反对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主义和普遍主义哲学。^[33]后现代哲学家罗蒂也认为,伯林“有助于铲除自由主义需要一套超历史的、绝对有效的‘概念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想法。”^[34]他象征着启蒙运动的自我消除和自我完成的胜利。他的实证主义反对启蒙的理性主义,尽管过去他的实证主义也惟有因为启蒙理性主义,才——以良性辩证的方式——成为可能。^[35]罗蒂赞同伯林的做法,认为自由的社会应该使自己摆脱启蒙运动对“哲学基础”的惦念,自由社会应该取消“哲学基础”。^[36]对于反基础主义的自由主义者罗蒂而言,没有哲学的假设,自由民主依然能够良好运作。按照这个观点,人们可以在拒绝启蒙的同时仍然相信自由民主。其实,这正是伯林所要做的事:抛弃启蒙运动理性主义一元论的形而上学错误,反对启蒙运动的一元式的“乌托邦”理想及其“基础主义”的思维取向,但依然维护启蒙运动对自由的追求。伯林从不因为没有从终极原则出发来为自由进行辩护而感到烦恼,他曾尖锐地暗示说,那些怀疑宗教教义的世俗理性主义者在没能为政治原理找到无懈可击的保证的情况下,开始怀念起了宗教信仰曾经给人们的种种安慰。伯林则根本不想寻求什么终极保证,“其持久性无法得到保证这一点丝毫无损于原理的神圣”。^[37]

但是,伯林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缺乏一种内在的明晰性,其思想内部存在着一些张力。首先,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张力。多元论是否能够成功地支撑起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能否兼容,这是很多学者所质疑的。约翰·格雷在评论伯林的思想时,强调他的价值多元论对现有自由主义的冲击,他指出:“伯林著作的最大难题是多元论和自由主义的紧张关系。”^[38]根据伯林思想的历史主义性格,格雷这样分析到:

对伯林来说,价值是历史创造的,是体现在特殊生活方式之中的。这一点对于自由价值和其价

值都是真实的：由于这些价值源于特殊的生活方式，它们的权威性是地方性的，而不是普遍的。伯林价值多元论的历史主义的方面，或者说它所隐含的含义，是我们断然放弃为自由主义寻求普遍根据的工作，相反，而应该接受自由主义只是许多生活方式——这些方式在普遍的最基本的价值的共同人类视野中都可能是人类繁荣发展的形式——中的一种方式。^[39]

在格雷看来，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削弱了自由主义的道德基础，他的多元主义使得他对自由主义的辩护变得狭窄了。莱斯诺夫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对众人给予伯林“以自由主义斗士而闻名于世”的这项殊荣表示怀疑。^[40]他指出：“伯林的多元论以捍卫自由主义起家，结果却是认可了自由主义的一个最凶恶的敌人——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41]社群主义者迈克尔·桑德尔则认为伯林的多元主义容易滑落成为各种形式的道德怀疑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因而丧失了社会与政治批判必须依据的道德原则。他这样反诘伯林：

如果一个人的信念只是相对地有效，为什么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信念呢？伯林假定的道德宇宙具有悲剧性的构造（指价值的互不相容或不可共量），问题是，自由理想难道不和其它相竞的理想一样，都要受到价值的终极不可共量性的约束？若是如此，为什么自由理想具有优越的地位？而如果自由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地位，如果它只是众多价值之一，什么可以支持自由主义？^[42]

可见，伯林在多元论的基础上为自由主义所作的辩护并非完全成功，他的思想一直被一种含糊性所缠绕。实际上，伯林也看到了自由主义与多元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但是他却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来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立场。正如他所强调的：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差异，在于前者了解个人信念只具相对有效性，但却能够坚定不移地捍卫这些信念。

其次，消极自由与文化归属之间的张力。消极自由与文化归属的思想是构成伯林政治自由主义最根本的东西，伯林的政治自由主义预设了消极自由与文化归属这两个价值是相互支撑的，文化归属是实现自由主义之目标的必要条件。在伯林看来，只有消极自由的制度化，才能够保证文化多元主义的繁荣，因为只有在不干涉个人的选择自由的前提下，各种相互冲突的价值才能够共存于一个社会中，因此，消极自由是繁荣文化多元主义

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要繁荣和发展多元文化，单依靠消极自由的制度化是不够的，还必须赋予人们归属于他们自身的文化的权利。只有当人们归属于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相同的文化时，才能够行使消极自由的权利。伯林为了建立一个没有任何损失的文化多元主义的自由秩序，他把文化归属视为实现消极自由的条件。但是，伯林在阐述消极自由的概念时所力图避免的正是给消极自由附上任何限制条件。在伯林看来，给消极自由限定任何条件，都将违反文化多元主义的规范性前提，因为，对行使消极自由的某种阻碍物的揭示都是在肯定某种价值的基础上的。可见，消极自由与文化归属这两个价值几乎是相互排斥的，它们之间的不可兼容性必然会削弱伯林的政治自由主义。

四、基本结论

伯林试图把自由主义理论建立在多元论的基础之上，但是这种综合并没有取得成功。从伯林的论证中我们可以看出，选择活动对于自我创造的重要性以及自我创造对于人之为人的必要性为其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但是，在伯林的多元论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表明选择的自由为何不应该是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而是值得优先考虑的价值，亦即从多元论中并不必然推导出自由选择这一价值的优先性。实际上，伯林也意识到了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这种挥之不去的紧张关系。在Ramin Jahanbegloo的对话中，伯林指出：“多元论与自由主义是互不相同甚至也互不交叉的两个概念，这两者并没有逻辑上的联系。”^[43]而关于迈斯特和索雷尔的例子也再次证明，多元论以及对一元论的反对，与自由主义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约翰·格雷认为，伯林的多元论使得他所捍卫的自由主义的阵地变狭小了，他指出：“要是寻找自由主义的基础的话，那么正是人类主体——选择活动是构成他的主体身份的最重要的因素——的历史性现实中，而不是在任何假设的从价值多元论真理能够推出选择本身具有最高价值的普遍推理之中，自由主义才找到了最好的基础。”^[44]也就是说，唯有根据人作为能进行选择的一种动物的本性，而不是根据价值多元论，自由主义才有权利向理智提出一种普遍的要求。格雷认为，消解多元论与自由主义之间的矛盾的办法是，把自由主义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把它当做是基于理性和基本人性的一般要求，或在历史中居于优先地位的某种主张。确实，伯林的价值多元论削

弱了自由主义合理性的论据,使得自由主义不得不放弃作为一种带有普遍的理性要求的政治理想,而只是作为许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选择,并且人们愿意实践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是一种带有偶然性的事情。那些为了消除或减弱自由主义的这种偶然性的种种计划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基础主义的倾向,而这正是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所竭力反对的。

可见,与其说伯林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捍卫者,不如说他自始至终是一位多元论的倡导者。伯林最大的学术成就在于拒斥一元论和揭示了价值多元论,认为我们的生活充满深刻的冲突和艰难的选择,那种认为各种价值都能和谐相处的一元论只不过是一种无视经验事实的形而上学幻想。正如罗杰·豪舍尔所指出的那样:“伯林著作的整体倾向就是扩大和加深我们对这种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绝对选择之必然性的意识。他使给人带来和谐与安宁的所有人生观都产生了裂痕,它们虽能消除紧张和痛苦,同时也削弱了人的活力和热情,使人们忘记自己的真实的人性。他不断呼吁我们回到自己的本质自由和责任上来。”^[45]只有在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的主张中,其思想的独特性以及永久性的成就才得以发现。

[参考文献]

- [1] C·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 [2] Isaiah Berlin. The Age of Enlightenment[M].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6. 29.
- [3] 伯林. 现实感[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
- [4] Ramin Jahanbegloo. Conversations with Isaiah Berlin[M]. London: Peter Halban, 1992. 70.
- [5] 徐大同. 当代西方政治思潮[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6] Isaiah Berlin. My intellectual path[A]. In: Henry Hardy, ed. The Power of Ideas[C].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5 - 6.
- [7] Isaiah Berlin. The Envy of the World[M].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96. 28.
- [8]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M]. London: John Murray, 1990. 34.
- [9] 伯林.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出版社, 2002.

- [10] Isaiah Berlin. The decline of utopian ideas in the west[A]. 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C]. 34.
- [11]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M]. London, 1990. 33 - 34.
- [12]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M]. London: John Murry. Birnbaum, Pierre. 1990. 57
- [13] 伯林. 反潮流:观念史论文集[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 [14]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idea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2. 48.
- [15] [16] [24] 伯林. 两种自由的概念[A]. 自由论[C].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 [17] Jean - Jacques Rousseau. On the Social Contract[M]. Trans: Masters J R, e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8. 55.
- [18] Berlin. Two concepts of liberty[A]. 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C].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52. 参见中文版:伯林. 两种自由的概念[A]. 自由论[C].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 [19] Isaiah Berlin. Russian Thinkers[M].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8. 193.
- [20] [32] 伊格纳季耶夫. 伯林传[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1.
- [21] Isaiah Berli. Four Essays on Liberty[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72. 参见中文版:伯林. 自由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 [22] Axel Honneth. Negative Freedom and Cultural Belong: An Unhealthy Tension in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Isaiah Berlin[J]. Social Reseach, 1999. 66(4):1064.
- [23] [30] Isaiah Berlin: The Crooked Timber of Humanity[M]. London: John Murry. Birnbaum, Pierre. 1990. 79 - 82, 37.
- [25] Isaiah Berlin. John Stuart Mill and the ends of life[A]. 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C].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4. 参见中文版:伯林. 自由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3. 53.
- [26] [27] Isaiah Berlin. Vico and Herder[M]. London: Hogarth Press, 1976. 39. New York: Viking, 1976. 39.
- [28] Robert Koci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Sir Isaiah

Berlin's Political Philosophy[M]. Lewiston :Edwin Mellen Press, 1989. 57.

[29] 伯林 . 反启蒙运动 [A] . 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C].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31] Isaiah Berlin. Two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a interview with Isaiah Berlin[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1. 22.

[33] Michael Kenny. Isaiah Berlin's Contribution to Modern Political Theory[J]. Political Studies ,2000 ,48 : 1028.

[34] 罗蒂 . 偶然、反讽与团结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5] [36] Richard Rorty.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M]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7-52 - 54. 参见中文版 :罗蒂 . 偶然、反讽与团结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37] 人类专门研究文选 [A] . 伊格纳季耶夫 . 伯林传[C].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38] [39] [44] 约翰·格雷 . 伯林 [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1999.

[40] [41] 莱斯诺夫 . 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42] Michael Sandel, ed. Liberalism and its Critics[M] .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4. 8.

[43] 拉明·贾汉贝格鲁 . 伯林谈话录 [M]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45] 伯林 . 反潮流 :观念史论文集·序言 [M]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彭 勃】

导师荐语：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 1909 - 1997)是当代英国知名政治哲学家,在学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在伯林后期特别是其过世之后,国际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伯林的热潮。然而相比之下,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我的博士研究生蒋柳萍撰写的《多元论与自由 :伯林反启蒙的自由主义思想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该文是将柳萍同学在从事博士论文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相关的研究正在深入之中。自由主义思想在伯林整个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而“多元论与自由”则构成了伯林自由主义思想的主轴,因此,该论文抓住了柏林思想脉络中的精髓和灵魂,对研究伯林的其他思想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相信,该项研究及其成果对于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邦佐